

每周视点

教育部门不能坐视高校、中学、考生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陷入缺乏客观、全面证据支持而徒然浪费时间、混淆公众认知的纯思辨与口水战之中,应该基于循证管理理念,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以事实说话,以务实、求实的思维推动自主招生改革的可持续发展。



自主招生:争议与完善

□王凌峰

重点大学自主招生(以下简称自主招生)改革从2003年起步,到2010年已有80所高校取得自主招生权。

最近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再次发文评论自主招生制度,认为,自主招生的改革价值不容否定,但实际操作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这引起对高校自主招生的又一波关注与讨论。

批评者认为,和很多改革一样,2003年伊始的高校5%自主招生试点,旨在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初衷与出发点是良好的,但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甚至表现出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的迹象。

首先,增大了高中生学习压力与课业负担,为了参加不同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考生需要在迎战高考之外,另作准备,自主招生考试已被称为“小高考”。

其二,自主招生异化为高校间争夺优秀生源之特殊手段。和很多处于同一城市的名牌大学自主招生考试时间一样,自主招生高校考试时间普遍冲突,考生只能非此即彼,被迫“作出非常艰难的决定”。对此,高校的理由是,教育部对自主招生考试时间有要求,难以错开安排,此外学生应该理性选择联考,没有必要选择参加多个联考。

这些理由很显站不住脚:自主招生联考时间仅为两三天,完全可以错开。至于考生有没有必要参加多个联考,当然应由学生本人根据自身情况决定,高校没有置喙之地。高校所做的只能是提供给考生尽可能多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不是越俎代庖地替考生作决定。

其三,公信力之犹。自主招生下,传统高考主要按照分数高低录取的约束机制基本失效,录取谁完全是高校说了算。

相对自主招生而言监督机制更严格完善的高考如此,监督力度大大弱于高考的自主招生,其公信力与公平性如何保证?如果自主招生制度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其发展轨迹与结局势必和在此之前的很多教育改革以及其他领域的改革措施一样:最初尚可以表现出一些积极作用与效果,随着时间推移,在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侵蚀下,逐渐走样、失真、变形,最后沦为新一轮改革的改革对象。

作为近10年来高考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举措,要废除自主招生政策几乎不可能,可做的只有改进与完善,因此提出若干建议如下:第一,5%上限不动摇;第二,自主招生应该后置于高考进行;第三,统一调度,安排自主招生时间,保障考生选择权;第四,对自主招生进行政策效果评估。

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能力服从正态分布,5%自主招生比例当然不可能做到“天下英雄入彀中”、野无遗贤,但是基本上可以达到筛选异于多数的少数“具有创新潜质、学科特长,以及全面发展、综合素质较高考生”(见教育部《普通高校自主招生录取试点工作办法(试行)》)之目的。

有少数高校自主招生简章显示其自主招生计划占招生总计划突破了教育部规定的5%比例,对此应该叫停。特例、先例大门一开,再难矣。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自主招生考试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争议不断,其政策成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应该严格控制自主招生比例。美国多数四年制本科院校尤其是招生数量大、录取比例低的一流大学,招生程序多是首先对申请者SAT(俗称“美国高考”),由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测试组织ETS命

题)或者ACT成绩、中学成绩、简历等因素初步筛选后,再决定是否面试,由此节约考生与高校成本,值得我国借鉴。

柯炳生文章指出,目前每年自主招生录取考生约1.5万人,其中2/3的被录取考生不参加自主招生也可通过高考进入被录取高校,换言之只有1/3考生是自主招生受益者。

基于这一事实,我国自主招生应该在高考成绩公布后进行,如此则大约1万名考生就不必再参加自主招生而直接被录取,大大节约考生、中学、高校为自主招生考试付出的考试成本,尤其是大大降低了自主招生对高中教学秩序的负面影响。

本年度的自主招生,“北约高校”、“华约高校”联考考试时间虽然错开,但是面试时两所龙头高校均确定在同一天,考生不得不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违背自主招生改革本意。

高校办学自主权需要保障,但不意味着高校变成“独立王国”,来自高校外部的合理管理与规划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自主招生考试时间普遍错开,表明在现阶段不能任由高校来确定自主招生考试时间。

已经施行8年的自主招生是对传统高考制度的一个改革举措,但其实践成效如何?对此各方面没有形成共识,反而处于高度争议状态。对于自主招生成效与利弊如何问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批评者往往基于相对客观的事实与现象,显得“实”;而支持者却往往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论据,诸如招收创新型人才、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借鉴欧美高等教育先进经验等,显得“虚”。

要准确评价自主招生政策的真正成

效,唯一途径只能是通过科学研究方法,取得相关客观数据与调查结果。自主招生考试已经实行了8年,具备了进行政策效果评估的基本条件。实际上,2010年围绕自主招生出现的争论也要求必须进行政策效果评估。

具体来说,应该将三类学生即高考与自主招生均通过考生,没通过高考、只通过自主招生考生,没有参加自主招生考试、通过高考被录取考生的家庭经济地位、大学成绩、就业去向、工作业绩等变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由此对高校自主招生考试的信度与效度进行科学研究,才能够对高考、自主招生两种人才筛选机制的效果进行客观评价。此外,政策效果评估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作用。

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招生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决策者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基于客观数据与事实制定政策。由于各种原因,某些地方的某些主事者想当然、拍脑袋,抱着良好的愿望而缺乏扎实的调查研究,匆匆出台改革措施,效果可想而知。某省高考10年内改8次,几乎一年一次,高考理应具有的政策连续性、严肃性荡然无存,可谓朝令夕改,引来批评与骂声无数,就是一例。

简言之,教育部门不能坐视高校、中学、考生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陷入缺乏客观、全面证据支持而徒然浪费时间、混淆公众认知的纯思辨与口水战之中,应该基于循证管理理念,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以事实说话,以务实、求实的思维推动自主招生改革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反思植树造林

□于长青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林业得到“突飞猛进”式发展:林业用地面积平均每年增加约400万公顷以上,森林面积平均每年增加约500万公顷以上。实际上,这增加的“林业用地面积”和“森林面积”很大成分上是把大量荒漠草原划为了“国家重点公益林”或“三北防护林”。

我国森林现状

根据国家林业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截至2008年,全国森林面积19545.22万公顷,森林覆盖率20.36%。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林地面积30378.19万公顷,森林面积19333.00万公顷,其中天然林面积11969.25万公顷,人工林保存面积6168.84万公顷,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

根据国家林业局编的《中国林业统计年鉴》,截至2009年,我国累计造林面积达268.69万公顷,占林业用地面积的88.45%,是全国森林面积的1.39倍、天然林面积的2.24倍。

这意味着,除我国121.72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和39283万平方公里的天然草原外(这两种土地类型由农业部管理),我国61.9%的国土已经全部绿化了,如果再除去根本不可能种树的高楼大厦居民房、公路铁路等建设用地、海拔3000米以上不长树也没法植树造林的高山地区、水域等,那么我国100%以上的国土上都被绿色化了。

实际上,根据1987年出版的中国林业年鉴,“全国宜于乔木林生长而又可用于发展林业的面积仅为2.8亿公顷,扣除林区内必须修建的房屋、道路,(我国)各种可能形成森林的面积约2.53亿公顷,森林覆盖率26.3%”,也就是说,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所有“各种可能形成森林”的面积(包括天然林)只有253万平方公里,这些面积如果全部成为森林,则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可以达到26.3%。

现在看来,我国的造林面积已经远远超过“所有可能形成森林的面积”了,而这其中还有约120万平方公里的天然林,这意味着我国除天然林外在这“所有可能形成森林的面积”范围内已经造了两遍林!

根据国家林业局公布的结果,截至2008年底,我国人工林保存面积为6168.84万公顷,这实际上只占全部同期造林面积的23.5%。但不管怎么说,根据国家林业局历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是逐年递增的,从解放初期的8.6%增加到2008年底的20.36%,增加了2.37倍,超额并提前完成了2010年底之前达到20%的宏伟目标。可是,我国目前的森林状况和森林覆盖率会好于解放初期吗?

森林如何“造”出来

我国森林面积的快速增长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森林覆盖率由原先徘徊在13%左右,5年内猛增到16%以上,这意味着平均每年要增加505万公顷的森林,而这期间国家林业局公布的人工林保存面积每年平均增加为205万公顷;上世纪90年代是我国森林采伐最为惨烈的年代——天然林几乎遭到毁灭性破坏,天然林面积急剧萎缩。

在这种情况下,多余出来的森林是怎么“造”出来的?上世纪,林业用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减少;进入本世纪以后,林业用地面积却急剧扩张,平均每年增加约400万公顷,这增加的林业用地又是从何而来?

在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地实施的公益林基金项目和三北防护林项目,可以很好地说明上述问题。现仅举一例:根据国家政策,牧民梁杰一家与嘎查(蒙古族的行政村)其他牧民一样,跟呼德呼格嘎查签订承包合同,承包草场24680亩,承包期为1997年11月至2027年11月,共计30年。2005年12月15日,当地镇政府、林业局到呼德呼格嘎查开会宣布:呼德呼格嘎查作为公益林项目实施地区实行全面禁牧,这意味着呼德呼格嘎查1729平方公里草场(已承包给牧民并颁发了草原证)一下子全变成了国家重点公益林。

根据《阿拉善右旗志》(2000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记载,阿拉善右旗全旗林业用地256.3万亩,占全旗土地总面积的2.3%,1998年森林面积164万亩,其中天然灌木林(梭梭)152.2万亩。根据《阿拉善右旗2009年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实施方案》,阿拉善右旗林业用地面积为1441.09万亩,占全旗土地总面积的12.87%,比2000年林业用地面积高出5.6倍;纳入中央财政补偿的重点公益林面积(也即公益林禁牧面积)共计784.9万亩,是2000年林业用地面积的3.06倍,森林面积的4.79倍。

这多出来的数倍的“森林”从何而来?实际上就是把大片的荒漠草原划为“公益林”而且还是重点公益林,剥夺了牧民的草场承包使用权。目前阿拉善右旗约有近一半的面积被划为国家重点公益林。这种荒漠草原为森林的问题并不是阿拉善右旗的个别现象(阿拉善右旗只是在认真地执行国家公益林政策),而是从阿拉善到整个内蒙古,再到新疆甘肃等全国所有干旱区草原牧区的普遍现象。

有关部门把大片大片的荒漠草原一下子变为国家重点公益林或者三北防护林,森林也就这么被“造”了出来。问题是这大片的变成“天然林”甚至是“国家重点公益林”的草原大部分只不过是高度仅有20~30公分的半木质化或木质化的荒漠植被,并没有一棵树。被禁牧的牧民望着世代放牧的草场,疑惑地问我:我的草场怎么一下子成了森林了呢?树在哪儿?

草原变森林的受益者是各级林业部门,一方面可以从国家获取巨大财政支持和项目资金,同时还是巨大的政绩,吃亏的是广大草原牧民,被忽悠的是国人。

重读植树造林

一位哈萨克牧民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你们(内地人)见到没有树的地方,没有庄稼的地方,没有房子的地方,都叫做“荒地”,都要开垦或种树,可在我们看来,那都是我们的草场啊!——我们为什么喜欢跟“荒山荒地”较劲,非要“消灭荒山荒地”甚至还要“誓把沙漠变绿洲”呢?

因此,我认为,林业不等于植树造林,发展林业不等于发展植树造林。植树不等于造林更不等于森林。植树造林在很大程度上被包装成生态保护和防治荒漠化沙漠化的代名词,但总体上受益者并不是我国的生态环境,而是有关部门,植树造林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有关部门的摇钱树。

植树造林曾经成为我国森林砍伐的精神寄托和借口,所谓“砍一棵造十棵”,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森林资源的巨大破坏和退化。植树造林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存在的严重问题,比如管理部门既是管理者又是最大受益者。

植树造林在我国存在严重的扩大化问题,必须严肃认真、科学理性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造林工程还要继续老王卖瓜自欺欺人硬着头皮“愚公移山”吗?

另外,造林工程必须由中立专家组予以客观评估,即便是生态工程,也需要进行中立的环境影响评估。

当前反思植树造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我国的生态保护政策和主导意识,荒漠化防治、自然资源保护管理等等重大议题的战略方向等,这关系到国计民生、子孙后代。

(作者为清华大学生态保护研究中心教授)



谁是大师?

□刘玉凯

如果说当今是“大师”“泰斗”泛滥而又没有大师的时代,虽然听起来有点矛盾,但细想一下并不是说了错话。虽然所谓“大师”也是一个没有界定好的俗称,或者敬称,也觉得还是应该研究一下谁能够担当得起大师。

大师一词,中国古代是有的。在先秦的典籍中,大师的主要职能是掌握乐律。《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荀子·王制》云:“禁淫声,以时顺俗,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大师,就是太师,杨倞注云:“大师,乐官之长。大读太。”到了汉代,《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之日,羣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乐师的地位很高,不是谁都能称太师的,反正会唱几首流行歌曲绝对不能称大师。司马迁《史

记》中称能够讲解《尚书》的人为大师,《史记·儒林列传》:“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到了清代大师之名有点俗滥了。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中称孙征君、黄宗羲、李二曲等学者才是大师,“北学南学;关学国初,孙征君讲学芥门,号为北学。余姚黄梨洲先生宗羲,教授其乡,数往来明越间,开塾讲肆,为南学。关中之士,则群奉西安李二曲先生,为人伦模楷,世称关学。”这三个都是明末思想家,也是学者。都有学问而且有思想的东西。孙奇逢(孙征君,下同),字启泰,号钟元,是明末东林学者中的重要人物。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世称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李颀,明清之

际哲学家,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因为“周至”的古字在《汉书》中解释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自幼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李二曲、孙奇逢、黄宗羲在明末并称“三大儒”。那才真是大师。但是,陈康祺批评道:“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无闻,词章险陋之夫,挟科擢进之术,俨然坐尊比,称大师矣。”这话说得太好了!他慨叹有明以来,学术已经荒芜,一些不懂文章学术的人,讲的都是科举应试的东西,还以大师自命,这是学问的堕落。听他这些话,真让我们有点困惑。我们现在大师到处都是,教育基本上是围着考试转,各种考试泛滥,真学问不知道是什么了。什么不是大师?一时一事的能手不都是

大师;因职业的关系,知名度高的人叫名人,不是大师;因为老了,学生比较多,有人拥戴,也不一定就配称为大师;因为官位高,吹捧的人如蜂如蚁,也不一定就是大师;因为有一手,也不能在什么事情上随便充大师;因为有钱,能够买通媒体吹捧自己,那就更不是什么大师了。其实,做事的能手是值得敬佩,但不必都以大师称颂。生活中的聪明人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大师,那根本不影响我们对一个人的道德和品行的评价。从文化的发展上说,我们需要许多实干的能手就行了,并不需要大师满天飞。

整个人类有我们的大师,各种职业中也有我们敬佩不已的大师;但是真正的大师应该是“伟大的人”,是一种文化的先驱者,是风气的开拓者,是通古今、辨风云、有思想的人,是在一种事业上有系统建树的人,是影响一个时代、至少影响一个历史时期的人。这样说,也就表明,不是大师,是要经过历史检验的;我们同时代的人有时很难说谁是大师;也许一个人在世的时候似乎很平常,但伟人是站在历史上的,他们的特点就是:离我们越远,越觉高大无比。因此自称大师肯定是可笑的,无端地赠送一个学者是什么什么大师,赠送者也是可笑的。

(作者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三言两语

选择很多时候是一种勇敢的放弃。
——方晓汾(个人博客)

农民如果越来越穷,食品安全就会越来越难以保障。
——程木(个人博客)

尽管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因为发表一个新学术思想而遭受不测,不再需要为科学而付出生命。但如果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科学发展的春天,各种创新思想可以很容易被人接受,那是太过乐观了。
——孙学军(个人博客)

有什么样的教育才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糟糕的教育只会带来糟糕的社会。
——王涛(个人博客)

异地高考的“硬骨头”应由国家啃。
——熊丙奇(个人博客)

美国慈善家卡耐基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但是中国的富豪们宁愿在耻辱中死,也不愿在慈善中生。”
——洪巧俊(个人博客)



管窥:学者的基本行为特征

□贾文彬

“管窥”一词,意为从管中窥物,比喻所见者狭小,见闻不广。其首见于《庄子·秋水》:“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后汉书·章帝纪》有言:“区区管窥,岂能照一隅哉!”与此相关的词语有以管窥天、管中窥豹、管窥蠡测、管窥蠡等。然仔细想来,古今中外的每位学者,无论是看世界还是观事物,其基本的行为特征“一言以蔽之”,可谓“管窥”。

英国的托马斯·克拉普在《科学简史——从科学仪器的发展看科学的历程》中写道:“新科学最后终于胜利,主要是因为有了可以利用的仪器,其中望远镜和显微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般望远镜和显微镜的人都清楚,这两种仪器均有‘管’存在。通过望远镜或显微镜观太空、看细菌等,就是典型的‘管窥’之举。泛而言之,学术论文的标题,如‘基于……的分析’云云;学术专著的题目,如《从系统观看世界》等等,皆是一种‘管窥’的自我申明。”

样本分析作为科学研究中的常用方法,即属于“管窥”之列。众所周知,总体包含的观察单位通常是大量的甚至是无限的,在实际工作中,一般不可能或不必对每个观察单位逐一进行研究。人们只能从中抽取一部分观察单位加以实际观察或调查研究,根据对这一部分观察单位的观察研究结果,再去推论和估计总体情况。例如,某河流被污染了,相关人员一般是用瓶

取水,尔后在实验室内进行分析,以了解整个河流的污染状况。何人见过分析人员将全河流水体统统分析的事例?无独有类。对大气污染物的检测,对土壤成分的分析,对生物资源的调查……科学工作者形式各异的“采样”分析,虽表现不同,但其质一也;说透了,皆“管窥”而已。所以,“管窥”是学者的基本行为特征。

据东汉文学家班固所著《汉书》载,东方朔《答客难》有言:“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筵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清代诗人陈康祺所著《燕下乡脞录》卷四云:“圣作圣述,权衡至精,管蠡浅见,乌足以及之。”难道真的“以管窥天”,就不能“通其条贯”吗?难道“管蠡”必“浅见”,一定“不足以知之”吗?从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形看,并非如此。

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是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创立者。他在1609年发表的伟大著作《新天文学》中提出了他的前两个行星运动定律。行星运动第一定律认为,每个行星都在一个椭圆形的轨道上绕太阳运转,而太阳位于这个椭圆轨道的一个焦点上。行星运动第二定律认为,行星运行离太阳越近则运行就越快,行星的速度以这样的方式变化:行星与太阳之间的连线在等时间内扫过的面积相等。1618年,开普勒发表了行星运动第三定律:行星距离太阳越远,它的运转周期越长;运转周期的

平方与到太阳之间距离的立方成正比。开普勒对天文学的贡献几乎可以与哥白尼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他计算所用的数据,主要是火星的运动数据,而非太阳系中当时已知的所有行星的运动数据。换言之,开普勒是以火星“管窥”到行星运动三定律的。

被誉为“理论物理学之父”的德国物理学家克里斯托勒(1893~1969),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标志着中心地理论的建立。迄今为止,克氏的中心地理论是研究城市和城市体系的最完善的理论体系。克里斯托勒就是从德国南部的中心地“管窥”到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规律的。

《三国志·蜀·郤正传·释》记载:“夫人心不同,实若其面,子虽光面,既美且艳,管窥篲举,守厥所见,未可以言八极之形埒,信万事之精也。”开普勒与克里斯托勒的事例表明,由“管窥”所见,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言八极之形埒,信万事之精也”的。至于怎样去“管窥”,注目于何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宋代诗人陆游《剑南诗稿·江亭》有云:“濠上观鱼非至乐,管中窥豹岂全非。”余曰:学界大家立典范,管窥篲举约全班。学者非非集中瞎?无人不在可全观。众目关注虽有异,集成所见尽了然。精制器创新管,奇景景象满山川。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城环学院教授)